

海洋的新边界

Regards sur la Terre 看地球II
Océans : la nouvelle frontière

皮埃尔·雅克 拉金德拉·K. 帕乔里 劳伦斯·图比娅娜/主编 潘革平/译
Pierre Jacquet Rajendra K. Pachauri Laurence Tubiana



. 013031956

海洋的新边界

Regards sur la Terre 看地球II
Océans : la nouvelle frontière

皮埃尔·雅克 拉金德拉·K. 帕乔里 劳伦斯·图比娅娜/主编 潘革平/译
Pierre Jacquet Rajendra K. Pachauri Laurence Tubiana

013031929

Regards sur la Terre 2011, L'annuel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Océans : la nouvelle frontière

Pierre Jacquet, Rajendra K. Pachauri, Laurence Tubiana (dir.)

A Planet for Lif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ction

Oceans: The New Frontier

Pierre Jacquet, Rajendra K. Pachauri, Laurence Tubiana (editors)

©2011.AGENCE FRANCAISE DE DEVELOPPMENT

本书根据法国开发署 (AFD) 2011 年版译出

013031956

P74
22
V2

Regards sur la Terre 看地球II
Océans : la nouvelle frontière

皮埃尔·雅克 拉金德拉·K. 帕乔里 劳伦斯·图比娅娜/主编 潘革平/译
Pierre Jacquet Rajendra K. Pachauri Laurence Tubiana



P74
22
V2



北航

C163913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洋的新边界 / (法) 雅克, (印度) 帕乔里, (法) 图比娅娜主编;
潘革平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4

(看地球; 2)

ISBN 978 - 7 - 5097 - 4104 - 7

I. ①海… II. ①雅…②帕…③图…④潘… III. ①海洋经济学—
世界 IV. ①P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580 号

海洋的新边界 (看地球 II)

主 编 / 皮埃尔·雅克 拉金德拉·K. 帕乔里 劳伦斯·图比娅娜
译 者 / 潘革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董风云 段其刚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丁爱兵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2.25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 308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104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727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8 总论 一个新兴世界
皮埃尔·雅克, 拉金德拉·K. 帕乔里,
劳伦斯·图比娅娜
- 16 引言 海洋: 新边界
拉斐尔·若藏, 朱利安·罗谢特,
桑吉维·孙达尔
- 23 第一章 与海洋共谋未来
戴维·卡隆
- 30 第二章 一个待发现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评估
埃尔娃·埃斯科巴尔, 朱利安·巴尔比埃
- 37 **聚焦** 海底山: 生物多样性的绿洲?
莫里吉奥·武尔茨
- 41 **聚焦** 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评估
托马斯·比内, 艾德琳·博罗·德巴蒂斯蒂,
皮埃尔·法耶
- 45 第三章 海洋: 取之不尽的能源之源?
乔·阿皮奥蒂
- 54 第四章 全球化的海洋经济: 何种代价?
帕特里克·肖梅特
- 63 **聚焦** 船舶拆解: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玛丽·布雷尔
- 67 第五章 鱼与人的关系:
如何管理“不可管理者”?
雅恩·彼得·约翰森, 彼得·霍尔姆,
彼得·辛克莱, 迪安·巴温顿
- 76 **聚焦** 鱼类资源枯竭: 水产养殖能替代吗?
索菲·吉拉尔, 菲利普·格罗
- 80 第六章 海洋治理: 过于分散的管理框架?
迪雷·特拉迪
- 87 第七章 海洋保护的区域路径:
“区域海洋”的经验
朱利安·罗谢特, 吕西安·沙巴松
- 96 **聚焦** 东非: 生态系统方法的贡献
克莱尔·阿特伍德
- 99 **聚焦** 欧盟“Natura 2000”网络: 欲向海洋
领域延伸
洛朗·热尔曼

- 103 **聚焦** 东非：陆地源污染防治
阿孔加·莫马尼
- 107 第八章 海上运输：经济与环境问题的交汇点
安托万·弗雷蒙
- 117 第九章 打击非法捕捞
戈登·蒙罗，拉希德·苏迈拉
- 125 **聚焦** 渔业码头：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
弗朗索瓦·亨利，迪迪埃·西蒙
- 128 **聚焦** 欧盟与西非的渔业协定评述
托马斯·比内，皮埃尔·法耶
- 134 第十章 有关捕鲸之争的观点交锋
雷米·帕芒蒂埃，森下助二
- 144 第十一章 海洋遗传资源，
活体专利申请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戴维·利里
- 153 **聚焦**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地位问题：相关国际
讨论详解
瓦伦丁娜·格尔马尼，夏洛特·萨尔皮尼
- 156 第十二章 海洋增铁“施肥”：
2009 年德印联合科考行动
赛义德·瓦吉赫·纳克维，
维克托·斯梅塔切克，阿尔弗雷德·韦格纳
- 165 第十三章 北极治理的挑战
尼尔·汉密尔顿
- 173 **聚焦** 海上石油开采或将受到国际监管？
吕西安·沙巴松
- 178 **聚焦** 一个塑料的海洋：太平洋垃圾旋涡
保罗·约恩斯通，戴维·桑蒂洛，
米歇尔·奥尔索普，理查德·佩奇
- 182 第十四章 气候：海洋的挑战
苏珊·艾弗里，亚历山大·马尼安，
本杰明·加尔诺，斯科特·多尼

一个新兴世界

皮埃尔·雅克 (Pierre Jacquet)

法国开发署首席经济学家、法国国立桥路大学教授、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会员

拉金德拉·K. 帕乔里 (Rajendra K. Pachauri)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 (GIEC) 主席、印度能源和资源研究所 (TERI) 所长

劳伦斯·图比娅娜 (Laurence Tubiana) 主编

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Iddri) 所长, 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即将结束之际,《看地球》系列丛书决定将这一活动进一步延伸,把专辑2011年版的主题定为海洋。事实上,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也是未来几十年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海洋不仅在调节气候、食物和工业、交通运输、娱乐、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创新、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非法活动或冲突、社会传统以及一些虚构的故事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洋是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和政治等各种问题的交汇点,它们也因此成为人类活动的“新边界”,成为集体行为以及社会与自然资源之间互动的一个巨大的试验场。这些主题将是2011年版《看地球》丛书的核心内容,之后在导论部分将有更详细的介绍。

在这一开篇概述中,我们将对可持续发展行动的背景作简要回顾。首先,2007年爆发的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及影响,使得一些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支柱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人们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对各国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以及对各国政府把公共资金用于促进绿色和包容性增长的能力等方面的担忧也更加强烈了。然而,2010年仍然取得了

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在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问题首脑会议(2010年10月18日至29日)以及在坎昆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此次会议使得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峰会上遭遇困难的多边谈判得以重启。这些事例证实了各级治理机构——包括地方治理机构与全球性治理机构——之间的互动。

怎样的经济模式会从危机中脱颖而出?

在危机爆发三年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有所好转,现在可以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了吗?当然,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过去。然而这种冲击对于宏观局势、经济增长潜力、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国际关系以及全球化治理等方面的后续影响仍将持续很多年。从南到北,各种各样的救助计划发挥了作用。然而,一方面,这些计划虽然使不同的国家减少了损失,甚至加快了新兴经济体的复苏,但它们并没有解决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其特征是东方国家的流动性过剩而全球层面则缺乏协调的金融与货币治理;另一方面,这些救助计划也产生了后遗症,尤其是主要的

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公共财政难以为继的问题——欧元区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这里的财政赤字并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分离与重新定位

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受这场危机的影响要低于工业化国家。这些工业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疲软——最好的情况是经济有望于2011年或在未来的几年间恢复增长。与此相反，新兴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却颇为强劲——过去几十年间所进行的痛苦的经济调整使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获得了一定的腾挪空间，而这是十分有益的。当然，危机使各地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金融危机的冲击波通过全球贸易量的剧减而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但是，正如凯末尔·德尔维^①所说，这种外部形势趋同之下所掩藏的恰恰是结构性的分离，其表现形式就是不同地区之间增长潜力的差异。

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更为强劲的增长趋势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向亚洲和南方国家相对“倾斜”的步伐。那些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选择在世界事务中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这一点既可以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国际谈判中看到，也可以从国际相互依存关系所存在的问题的变化中看到。例如，国际日常收支失衡局面的调整以及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就是看那些拥有巨大盈余的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是否有能力对其增长模式进行调整：由过去的依赖出口转变为依靠内需来支撑——这其中既涉及经济政策，也会涉及社会政策的调整。这一转型正在进行当中，但它会以一种缓慢而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在金融领域，新兴国家也从当前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并以一种谨慎而自主的方式改革自己的金融市场，今后还会更多地控制自己参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方式^②。如今，这些新兴经济强国已参与到国际集体规则的谈判中来，并在采取主动行动、提出建议等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能力：这些建议所涉及的领域既包括货币和金融，也包括环境保护。

非洲的新边界

非洲经济也显示出了巨大的抗冲击能力^③，这在一定程度是因为它们介入全球金融往来的程度并不高，因而未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2010年非洲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农产品以及矿产市场价格的上涨。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强劲的增长势头。尽管正如2010年9月21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发展大会的报告所揭示的那样，非洲大陆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仍然滞后，无法在预定的期限内达到目标，但许多非洲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明显好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④。私人投资者重新对非洲产生了兴趣，而分析

① 2010年11月25日在巴黎经济学院举办的卡普钦斯基系列研讨会上，他做了一个名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讲。详见：www.parisschoolofeconomics.eu/IMG/pdf/KDervis-PSE-251110.pdf。

② 请参阅Bellocq F.-X. et Zlotowski Y., 2011年,《后危机时代的新兴国家：金融一体化提上日程?》(Les pays émergents dans l'après-crise: l'intégration financière en question?), 原载《金融经济》(Revue d'économie financière), 3, n° 101。

③ 请参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抗打击性与风险》(Afrique subsaharienne. Résilience et risques), 区域经济展望。详见以下网址：www.imf.org/external/french。

④ 请参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PNUD), 2010年,《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 详见以下网址：hdr.undp.org/fr。

家则不断强调非洲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大陆^①。

显然，非洲仍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当然，2010年1月的突尼斯革命为这个国家乃至其他国家向真正的民主制度过渡开了个好头。但是非洲仍然是一个复兴缓慢、冲突和民主阵痛不断的地区。2010年底科特迪瓦的总统选举以及此前几内亚、布隆迪和卢旺达的选举都说明了这一点。萨赫勒地区以及东非依然活跃着自称是属基地组织的恐怖组织。在自然灾害面前，非洲大陆仍然十分脆弱，每年的干旱或水灾都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非洲在人口结构的转型方面所出现的滞后现象使得这里的人口到2050年几乎将翻一番，从而带来巨大的挑战：年轻人的就业以及城市化。非洲大陆的增长方式以及国际一体化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除了对自然资源的管理——这方面所固有的困难除了人所共知的（争夺收益而发生的斗争、“荷兰病”^②、多元化动力不足）之外，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是农业。无论是自给型还是出口型的农业，长期以来都被各国公共政策和国际资金所忽视。直到2008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农业的优先地位才重新被人们认可。从现在开始，应当付诸实施对农业的扶持，既要考虑到养活当地人的重大问题，也要顾及农业食品工业以及出口的问题，还要注意面对价格波动粮食地位十分脆弱这一问题——这将是2011年法国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以及那些与“土地掠夺”相关的问题：利用外国投资来进行土地开发应当是一种不错的做法，

但前提是这些外资必须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转让收益。第二个问题与非洲的工业化模式、其生产结构的多元化及公共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非洲大陆融入全球化的方式等有关^③。非洲在工业化方面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非洲工业化落后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不足、能源供应昂贵上，而且还体现在与市场的割裂上。第三个方面则与社会政策有关：社会政策是走出贫困陷阱所必不可缺的，它能为民众应对那些威胁人类活动的风险提供必要的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必要。此时，“援助”这个术语越来越多显得不合时宜。在这方面，有两大因素值得人们加以深入研究。首先，公共资金在促进发展资金的投入以及促进公共及私营业者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富裕国家的目的并不只是简单地向穷国提供公共资金，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帮助纠正本地市场以及国际市场上所存在的一些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私人投资的乏力。捐助国所提供的公共资金能发挥的促进作用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寻求新的投资资金，寻求新的干预方式，金融工具的创新——使之更能满足受助方的需要，提高能力建设以及帮助地方制订公共政策等。

第二是转移政策——人们可以简单地称为“北南间的”（转移政策）——预示着一种初级的、隐式的全球公共政策正在逐渐形成。这种说法主要依据的是公共政策以下三方面的功能^④：再分配功能——这与发展援助通常主打的“慈善”口号相符合，而且也

① 请参阅塞韦里诺（Severino J.-M.）和雷（Ray O.），2010年，《非洲的时代》（*Le Temps de l'Afrique*），巴黎，Odile Jacob 出版社。

② 是指一个国家因为发现了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外资的大量涌入之后，其外汇突然被高估的一种经济机制。

③ 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 *L'Afrique branchée: les ports maritimes, les télécommunications*），原载 *Afrique contemporaine*，n° 234，2010。

④ 由马斯格雷夫·R（Musgrave R.）和马斯格雷夫·P.（Musgrave P.）提出。1989年，《公共财政的理论与实践》（*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保留了这种援助的重要性；作为资金拨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式符合了上述的变化趋势；作为一个稳定的因素——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构想，但最近的危机已经提供了一个例证，因为捐助者所提供的部分“援助”——包括多边援助和双边援助——已经参与到了反经济周期的活动当中。

阴霾中的北方

然而，危机给工业化国家留下了一个需要解决的沉重的债务问题。为了扶持经济活动，那些在这场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十分沉重的私人债务负担逐步被公共债务所取代，从而使公共财政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未来几年经济政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与所要展开的调整的性质有着很大关系。虽然这个问题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英国）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但人们谈论最多的仍然是欧元区的债务问题，而且它已经引起了那些最敏感的市场反应。

欧洲债务危机与全球日常收支失衡一样，都使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在治理方面一些固有的困难大白于天下。那些在收支方面有盈余的国家试图否认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出现所应承担的责任，并想把调整的重担推给那些赤字累累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此前说过的相关责任之争。这有时看起来是合理的。例如，从国际层面看，日常收支的巨额赤字——这场危机使之略有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过度消费造成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家庭储蓄乃至国家储蓄急剧减少，从而使得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盈余资金从80年代相继以投资的形式涌入美国。那种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储蓄过多的说法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而在欧洲，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德国指责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在公共财政管理方面不负责任。

但这些指控至少有两方面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它们错误地理解了经济相互依赖的范围：不管其中的责任在谁，所有国家都已受到了当前危机的影响，而且各国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共同应对，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负债沉重的国家（不管它们是公共债务还是私人债务）必须尽快削减过多的债务，而那些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更应积极支持经济增长。在欧洲范围内所展开的讨论（关于德国的作用）以及在国际范围内所展开的讨论（关于中国的作用）表明，要想未来的调整顺利进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这些指控忽视了此类问题一定存在着对称性。只要有过度负债的国家，就必然有过度放贷和过度投资的债权人。这些过度沉重的债务肯定不会只有一个债权人。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重建而提出的建议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对责任和义务的不对称性问题进行过精辟的分析。在当今各大国都在努力寻求危机的有效应对之策的时候，法国担任轮值主席的二十国集团希望解决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

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反过来为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管理以及建立适宜的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新挑战。事实上，这些困难会使各国产生只顾保全本国利益的退缩心态：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所顾及的只有那些眼前的、短期的东西，国家利益自然会受重视。其中所蕴藏的危险是：原本想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进行规范的合理想法最终会演变成狭隘的保护主义思维，而这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都是十分有害的。在这种背景下，巩固多边框架显得更为迫切。在贸易领域，2010年最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多哈回合谈判陷入了僵局——各方似乎都认为达成协议并不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好处。除了贸易领域外，当前国际背景下还存在着另一个特别危险的现

象：人们未对多边体制投入足够的精力，而是听任各国向后退缩的警笛长鸣。

绿色增长现状如何？

2010年是有关环境问题的谈判最为紧张的一年，包括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在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问题首脑会议以及在坎昆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

一个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协议

2010年10月在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达成了一项议定书，它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发出了本年度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的第一个积极信号。防范生物多样性受损害的目标以一种务实的方式被重新修订：各国今后将不再制定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全球性目标，而是按照不同的经济领域制定行业性目标（农业、渔业、工业）——这些经济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建立一个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GIEC）相类似的机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原则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而在三年前这个想法曾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质疑。

在日本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还通过一项关于遗传资源的使用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协议，并决定要进一步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这项于2002年开始启动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是对多边体制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而知识产权正是国际谈判中冲突最多的领域。协议的达成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而拥有巨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将是其中的受益方。

名古屋协议还表明，联合国进程虽然饱受批评，但它依然是有效的，也能最终达成共识。这一

协议获得了193个成员国的通过，只有美国除外，因为美国并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最后，此次谈判还释放了另一个重要的信号，即新兴国家在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参与性和主动性：正是它们自2002年以来与欧洲的一起努力才使名古屋会议修成正果。如今，它们已经可被视为国际体系的贡献者，而不能再被视为被动参与者（*norm takers*）或搭便车者。这些积极的信号无意中达到了在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气候问题上的进展

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尽快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目标虽然未被完全放弃，但至少已被推迟。然而，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首先，在丹麦未能正式通过的《哥本哈根政治协定》中的一些要素被融入了缔约方大会的一个全面决议当中。其次，在森林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旨在减少发展中国家森林砍伐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REDD新机制”已正式启动。相关监督和监测机制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最后，在金融架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其次，坎昆协定重拾了人们对多边进程的信心。它建立起了一套对各国的行动进行检测和核查的新机制，其约束力的大小将视各国的发展状况而定。当然，目前的透明度还不能保证每个国家都能履行自己的承诺。但是这些设计中的机构——尤其是对各国所提交的资料 and 结果进行国际核查的做法——将建立起一套各国比拼声誉的比对框架。这种互相监督的机制十分重要，因为它回应了两大类困扰当前行动的疑虑与担忧。其一是采取单边行动的风险。事实上，当各国政府和经济行为体意识到自己将独自承担风险时，

它们都不愿采取行动，因此，它能降低其他与自己存在竞争或敌对关系的国家或行为体是否采取行动的不确定性。其二则与各方履行承诺的能力（各国政府都会低估自己的能力）以及气候政策的可行性有关。实现“无碳”经济这样的前景是现实的吗？其三，从监测中所获得的信息还能发挥出引人模仿或鼓励他人加入的作用——这一切对国际协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宣布的“绿色气候基金”得以建立。它的建立是为了对发展中国家所展开的气候变化适应和气候变化减缓行动提供帮助。该基金将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共同管理。按照《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在2010~2012年要为该基金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2013~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缺资金的筹措以及基金的运行模式仍有待进一步的明确。重要的是，这一基金不应当被设计成一个不同于现存国际机构的新机构，而应当能更好地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并通过提供额外资金的方式更好地调动原有的公共及私人资金，以达到促进行动的目的。如今，双边资助者所提供的资金已经占到了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适应和气候变化减缓行动方面开支总额的近50%（2008年和2009年）。

最后，坎昆会议还具有政治和象征意义。多边进程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被大大削弱。许多分析家和政治家甚至由此得出结论：今后必须寻找其他的方式和论坛来推进气候问题的谈判，以便能增进效率。坎昆会议使联合国进程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协议是在最后一个晚上以所有成员国（只有玻利维亚除外）长时间鼓掌的方式获得通过的。坎昆会议还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新角色。会议的东道国墨西哥、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协议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印度——这可能是这个国家在多边谈判领域的第一次——和墨西哥都是其中重要的缔造者。印度与中国展开了长时间的双边讨论。

气候领域集体行动的局限

然而，坎昆协定在《京都议定书》的后续行动方面并没有任何表述，也没有强调要用一个类似的协定将其取而代之。此外——而且这一点是最令人担忧的：坎昆协定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确认的行动承诺——这些减排承诺都是在2010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做出的——即使在落实得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以实现将全球变暖的幅度控制在 2°C 以内这一公开宣称的目标。今天唯一可能达成的协议是通过一些单方面的、不具约束力的行动承诺。然而，当人们进行了累计分析后便发现了这些单边行动（即便把地方政策的行动和国家层面的行动都计算在内）的缺陷所在。各国自发开展的行动并不能保证气候变化不会滑向最糟糕的状况。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重大突破应当是在2013年通过一个修正条款，用新的科学评价方式对各方所展开的行动及其影响进行全面评估。这一重新评估可以明确已取得的进步，从而达到推进这项运动的目的。

另一个问题与气候融资有关：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融资高级别咨询小组（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和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是该小组的联合主席）所提交的报告在坎昆会议上获得批准。这一小组在哥本哈根正式成立，主要负责确定新的融资来源并就筹措资金提出建议。最终，这一小组给出了一系列潜在资金来源的列表，但既没有明确具体的优先事项，也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就资金来源做决定的最佳场合仍在探寻之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负责这一问题似乎缺少一定的合法性（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是环境部长，而不是财务部

长)。而短期来看,只少数几个国家能接受让二十国集团来牵头处理气候融资的问题。因此,拟议中的金融交易税或国际运输税等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当务之急是为气候绿色基金筹措到更多的资金。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应当筹措到更多的资金用于低碳经济转型所需的投入。这是一个事关经济增长还是发展绿色经济的问题:这些国家真的会全身心投入到发展轨迹转型这场运动中来吗?

半杯空还是半杯满?

在有关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报告》[译注:Stiglitz-Sen-Fitoussi report。2008年2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请求曾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组建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国际专家小组,研究全球最广泛采用的经济活动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最终报告于2009年9月公布]公布一年多之后,“衡量”一词成了一个热门话题^①。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利用人类发展指数推出20周年之际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这一指数进行了大幅度的更新,引进了一些更为贴切的新指标。本着《斯特恩报告》(译注: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为英国政府撰写的有关气候变化在经济学上的影响的一个报告。该报告于2006年10月30日公布,它探讨了影响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精神,在帕万·苏克

德夫领导下而撰写的《欧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TEEB)报告》^②旨在唤起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问题的关注。

然而,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对于“绿色增长”的衡量才刚刚起步。但是,与那些有关“半杯空”的批评不同,我们更愿意强调那些已取得的进步,包括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在国际社会的多方压力(科学家的警告、越来越多的舆论宣传动员、消费者行为的改变等)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意愿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每个国家在实施环保政策方面都已经有所行动。这些行动都已存在,而且不容小视。

最近十年来,中国政府把许多环保议题纳入了自己的政治议程当中。这是世界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创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0年)使得污染者要承担起举证的责任。环保方面的一些量化目标被写进了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规定了将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10%以及能源消耗强度比“十五”期末下降20%的目标。而“十二五”规划(2011~2016年)则更具标志意义,它规定了要在2020年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以及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的目标。此外,中国政府还开始考虑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但是,中国并不是唯一采取类似行动的国家。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毛里求斯和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重大行动。

① 例如,由法国开发署和欧洲发展网络(EUDN)共同组织的一个名为“衡量‘衡量’:人们真的能对发展作出衡量吗?”会议2010年12月1日在巴黎召开,与会人数超过1000人。

② 欧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TEEB),2010年,《自然经济的整合:欧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的方法、结论与建议综述》,详见以下网址:www.teebweb.org。

然而，在欧洲，由于危机的影响，再加上人们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失望，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团体开始反对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到 2020 年减少 30% 的目标，并欲将这些从长期来看必不可缺的改革尽可能推迟。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说法也有了一些拥护者：他们主张“暂停”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希望将这一切推迟到好日子来临再说。在中国，总额达 4000 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也包含着一些高能源消耗的项目（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钢铁、金属和水泥……），这使得中国

的碳排放量在一段时间维持平稳之后再度上扬。而在美国，尽管奥巴马总统一再表态，联邦政府始终难以出台一条明晰的政策。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遭到了被共和党所把控的国会强烈反对：共和党把环保政策方面的态度当成自己区别于民主党的一个标准。

总体来看，用创新带动增长、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真正的认同：这一构想仍有待补充完善，使其变得更切实可信。毫无疑问，这将是未来几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挑战。

海洋：新边界

拉斐尔·若藏 (Raphaël JOZAN)
法国开发署 (AFD)

桑吉维·孙达尔 (Sanviji SUNDAR)
印度能源和资源研究所 (TERI)

朱利安·罗谢特 (Julien ROCHETTE)
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Idri)

在过去的 20 世纪，海洋的边界不断遭到挤压。自沿海民众逐步开始征服海洋这一恶劣环境的那个时代起，这个决定性因素彻底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人类的足迹如今已经能抵达所有的海域。离海岸的距离以及海水的深度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一再突破海洋的界限，不断从海洋获取各类资源，包括渔业资源、矿产以及遗传资源等。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发明创造的涌现、工业需求、国家的战略需求以及近年所出现的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要求，海洋的边界线被不断地重新改写。对此，没有一片海域能够幸免。

北极的例子最有象征意义^①。虽然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里仍然是一个交通不便、未得到多少开发的冰雪世界，但实际上这里正在上演着激烈的能源争夺。对此，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俄罗斯的科学家的在这里的海底插上了他们国家的国旗。这种争夺与 20 世纪以来能源行业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蕴藏在海底

的化石燃料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全球化石燃料的供应 30% 来自海洋，而这种燃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市场上几乎见不到踪影。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人类对能源的胃口越来越大，海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更多“深海”的石油被开采出来，而沿海海域到处安装了海上风力发电机组^②。

新的发现使得人类每一天都在推进海洋的界限。“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项目估计，过去 10 年间人们共发现了近 6000 多个新物种。近年来航海和捕捞等领域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使得一些海洋生态系统被人们开发利用，如一些位于公海深处的海底山：这些地区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这里才出现大规模的渔业捕捞^③。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各种养鱼场和贝类养殖场大量出现，所采用的正是过去人们饲养家禽家畜的方式。2008 年，水产养殖业提供的产品占了全球水产品总量的 37%，海洋成了全球蛋白供应的一个重要来源。

① Hamilton N. T. M., 《Les défis de la gouvernance de l'Arctique》, p. 319-327 dans cet ouvrage.

② Appiot J., 《Les océans : une source d'énergie inépuisable ?》, p. 185-194 ; Chabason L., 《Vers une rég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exploitation pétrolière offshore ?》, p. 328-332.

③ Würtz M., 《Les monts sous-marins : des oasis de biodiversité》, p. 176-179.